

走向一种共生性的全球生态文明

——第12届“克莱蒙生态文明国际论坛”综述

张磊 樊美筠

2018年4月27日，景色旖旎的世界著名生态小城美国克莱蒙群贤毕至。第12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暨首届“国际生态文明青年论坛”在此召开。此次论坛由著名海外智库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克莱蒙市政府、美国生态文明研究院、美国克莱蒙培泽学院、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黄河科技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主办。来自欧洲及中国、美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缅甸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160余位中外与会代表在“生态文明与共生性发展”主题下，围绕“共生”这一关键词，分别就“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生态文明的基本理论内涵”“生态文明的实践进展”“生态文明与中国”“青年与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以及“生态文明文化与教育”等论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交流，在学术思想、理念创新和实践路径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正如论坛的主要组织者，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樊美筠博士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所言，生态文明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它需要我们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以及我们每个人全身心的付出。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既能求知，又能行动，一种世界观级别的变革才有可能产生：生态文明是我们共同的机会。

一、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樊美筠博士在题为《生态文明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一个怀特海

有机哲学的视角》的论文中认为，根植于现代实体哲学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是当前全球范围内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由于文明是建立在某些基本哲学观念之上，观念不同，世界的愿景和文明的形式及内容也就非常不同。因此，反思工业文明，构建生态文明就不能仅从制度层面开展，更需要从哲学观念层面进行，为生态文明提供新型的哲学观念——“动在”。与奠基于牛顿力学之上的现代西方哲学将“实体”作为最基本观念不同，以量子力学为基础的怀特海过程哲学是将“动在”作为最基本观念。作为过程哲学基本观念的“动在”，首先是“构成世界的终极实在事物”，是一个“能量事件”。与“实体”在变化中保持自身不变不同，“动在”处于永恒变化之中；其次，“动在”是一种包括世间万物在内的由身体经验和智力经验“两极”构成，以“摄入”为主要方式的经验；再次，“动在”即“互在”与“共在”。“动在”不可独立存在，不仅存在于自身之中，更同时存在于其他“动在”之中，是超越“主体与客体”的“超体”；最后，“动在”即“特在”。任何“动在”都有不可被其他事物所取代的特有价值，是为己价值、为它价值（工具价值）和整体价值（宗教价值）的统一。怀特海有机哲学以“动在”、“摄入”、“创造性”等核心概念破解了现代西方实体哲学的二元对立，呈现出鲜明一元论的、关系的、有机的特质。以此为基础构建的生态文明形态是有机的、内在的、和谐的与可持续发展的。构建生态文明既与以往的环境保护又与现代工业文明有着根本不同——它是变革，而不是改良。在这一过程中，包含着丰富有机哲学成分的中国传统哲学，需要与时俱进，以开放的心态，向他种文化和传统学习，完成自身的创造性转换，才能成为中国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法学院杨富斌教授在题为《作为生态文明之哲学基础的过程哲学》的文章中，对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内涵及该哲学作为生态文明哲学基础的理由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杨教授认为，从西方哲学史视域看，建立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基础上的怀特海

过程哲学，是对传统西方实体哲学的超越，是一种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诸流派的新哲学。与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不同，过程哲学明确地和自觉地要以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来建立奠定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形而上学思辨哲学体系并且同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和东方哲学具有某种相通性。这一哲学作为生态文明哲学基础的原因在于：一是过程哲学宇宙论把整个宇宙视为一个活的有机体，一个由各种事件构成的生成过程。这从哲学宇宙论和本体论高度说明了世界的有机性、过程性和关系性，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过程哲学基础；二是怀特海过程哲学中的过程原理、创造性原理等原理和观点以及怀特海本人诸多深邃智慧的洞见与论断本身就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最具启发性的哲学思想；三是把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同与时俱进的哲学唯物史观相结合，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四是作为怀特海整体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怀特海文明哲学，对文明的意义和价值有着深入的研究，对于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克莱蒙培泽学院政治学教授莎伦·斯诺伊思教授在题为《马克思“共生”理论的意义及其生态思维》的大会发言中，从哲学层面回答了共生的意识根源。斯诺伊思教授认为，人类没有普遍而永恒的自然，人类是历史的，自然本身也是历史的。人类在试图“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过程中，其社会行为同样受到了自然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反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使自然界和社会也发生相应变化，这就是所谓的“共生关系”。斯诺伊思从大自然是有生命的、观察影响结果、人的思想相互影响和意识是非局部四个层面递进阐述，同与会者分享了共生和关系性思维是生态意识的基本特征的核心观点。通过对共生关系的认识，我们可以明白，由于思想和意识具有统一性，因此我们可以随时通过改变自身行为使之与整个群体相互和谐。“自我改变是改变的基础。改变自我，然后改变世界。”斯诺伊思教授在发言中，大量引用了中国道家哲学语言与观点作为论据，令发言充满了文明“对话”的韵

味，充分彰显了斯诺伊思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稔和对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精准理解与把握。

美国西雅图有机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凯恩·克拉克博士在《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到底是什么？》的发言中，就克里福·柯布文中将中国传统儒释道哲学所蕴含的有机哲学思想引入怀特海有机哲学体系是否恰当这一问题同福克斯·柯布展开了对话。克拉克博士赞同柯布对机械论式的、原论式的唯物主义所做的批判，但仍有如下质疑：一是柯布将怀特海有机哲学思想比作“道佛”有机哲学的本体论的做法，或为奠定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带来困难；二是柯布所阐释的“道佛”有机哲学更适合于对怀特海有机哲学特征的推测，但这种推测的价值有待商榷；三是柯布“实在是母”“没有永恒的存在”“持久变化的关系”等命题，究竟属于怀特海有机哲学思想抑或是“道佛”的本体论思想尚待厘清；四是柯布将原因比作关系域中的波动，这种波动会产生新的情境，从而塑造新的具体结果的观点何以在《过程与实在》一书中几乎没有体现；五是柯布“秩序的新形式”“涌现”“创造性发展”“自发的想象”和“创造”等十分基本但重要的概念与命题尚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六是柯布将使命相同却分属两种思想的“道佛”本体论与怀特海有机哲学混同却不对两者的基本概念与命题做对比性说明的做法似有不妥。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鹿锦秋副教授在《生态正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意蕴》论文中认为，由于政治立场和阐释方法不同，“见人不见物”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见物不见人”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对生态正义意涵的理解上大相径庭。前者过分推崇凌驾于自然的人类利益，将生态正义视为脱离自然的单纯的社会环境正义；后者则片面宣扬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将生态正义视为脱离社会的纯粹的自然正义。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以实践第一的思维方式，立足“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从存在论、价值论、历史观三重维度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修正与超越，为科学认识和解决当代社会人与自然的

关系，深化对生态正义的理解提供了重要参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倪端华教授在《生态文明价值观：价值观的深刻革命》文中指出，人们在批判和反思工业文明发展之殇时，认识到必须实行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文明形态根本性转向，建设生态文明新时代。生态文明是建立在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统一，其所要实现的文明形态深刻革命，也体现在价值观的根本变革之上，具体为：一是生态文明价值观打破主客体对立，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生态文明价值观以系统思维，实现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三是生态文明价值观从价值论视角实现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统一；四是生态文明价值观在目标上实现人民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二、生态文明的基本理论内涵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博士在题为《追求双赢》的大会发言中指出，本次论坛的重点接近生态文明的精髓，并就“双赢”——改变生活方式以同时造福人类与环境——同与会者分享了自己的观点。柯布博士认为，尽管工业社会正是将我们引向绝望困境的原因，与生态文明相比，工业文明造成了更多自然环境的退化、资源衰竭并极大阻碍了贫困的解决。但立足于当今世界人口规模的现实，生态文明必须与工业文明的许多成就合作，以在减轻自然环境总体压力的同时，将人们从日益严重的贫困中解放出来。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生物圈的退化，目前肉类消费水平已超出地球的支持能力，这意味着富人需要做出牺牲，改变以肉类为主的饮食结构，转向素食，从而保证穷人的生存。这不仅有益于穷人，根据《整体：重新思考营养科学》一书的观点，也有益于富人的健康。同时，人们应该更多选择当地出产的食物，这既可以减少加工与运输的能源损耗，又可以避免均质化量产带来的生物多样性丧失

以及毒素增加的危害。“改变饮食结构能够是一个双赢的方案，每个人都可以更健康。许多人，富人与穷人，都可以心满意足地重新与自然环境相联系。”同样的，倘若城市能够以没有人会想念在城市中自驾的方式来建立，就是对都市栖居地而言的“双赢”方案。保罗·索拉里提出的“阿柯桑地”正是这一方案的典型。在“阿柯桑地”中，各种现有的城市功能被整合在一幢建筑里，城市没有了街区分割，人们可以从阿柯桑地的任何部分步行到其他的部分或者外面的世界，汽车因而失去了效用。这在降低自然环境压力的同时，能有效克服由于汽车所加剧的贫困。柯布博士最后指出，以上变化不容易发生，除非环境的崩溃迫使人们逃离现代性，但可能为时已晚。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最好的位置以引领世界，传统与现代的优势，可以使中国取而代之地计划建立一个生态文明。

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商学院前教授，罗马俱乐部成员大卫·柯藤博士在题为《生态文明与共同体理论》的大会发言中向与会者介绍了作为生态文明理论基础之一的共同体理论。柯藤博士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持续增长的企业权力和影响力正从不同方面加剧着世界的不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下的“企业理论”作为一种有缺陷的叙事，导致了社会系统崩溃的集体选择的出现。要避免自我毁灭，走向生态文明，企业理论及其所依赖的意识形态就必须被“共同体理论”这一不同于西方叙事方式的新理论所取代。共同体不仅以生命科学为基础，同时借鉴了中国古代文化，认识到思想和物质的不可分割性，强调整体性、平衡性、和谐性，强调复杂生命只存在于以自组织形式创造和维持生存条件的多物种共同体中，作为生物的人类，只能作为多种群生命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共同体理论，为东西方合作提供了潜在而有力的基础，也为人类过渡到一个与自然共生关系的可能未来提供了指导性的叙事方式，其中内含的组织定义价值和单位、治理结构和过程、资源流动等三条对于人类构建和管理自身生存方式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则，为人们重新界定企业价值、重置

自身与企业的关系以及反思自身在共同体中的责任与价值等问题提供了指导。柯藤博士强调，共同体理论将引导人类社会现有的生产生活模式发生改变，在此关键的抉择时刻，中国作为唯一有能力按照所需速度和意图做出选择的国家，其选择有着重要的意义：是继续维持着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以终结历史，还是引领世界建设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的生态文明。

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菲利普·克莱顿博士在题为《走向一种共生性的全球文明》的大会发言中指出，本届论坛以“生态文明与共生发展”为主题恰逢其时，“共生”是新时代生物学的核心理念并已成为一切与生态相关科学的思想灵魂，它意味着“生活在一起”。生态学家主要从生态系统中不同生物之间的“共生共存”与“利己行为”两个方面认识“共生”的生物学意义。社会学意义上的“共生”则指社会共生——民族、社群间的互利互惠关系。现今社会“共生”理念严重缺失，互惠现象仅存于家庭之中。要在国家层面实现共生理念非不可行却需要在满足诸如拥护权威的英明领导等条件的同时因应来自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利己主义等力量的破坏与阻挠，而显得异常艰难。但是随着地球耐受力达到极限，人们将会逐步学会创建共生社会，推进文明的转型进程。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在《生态文明新时代需要一种外交新思维》中指出，生态文明需要一种生态外交，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的有机外交”。与现代外交服膺机械世界观不同，建设性后现代有机外交服膺于一种更阔达、更深刻的有机世界观，将宇宙视之为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有机的生命共同体并将生态意识作为有机外交的意识，超越人类中心论的弊端；推重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双赢式共生性发展和作为对现代分离意识与尚争意识超越的共情主义情怀。生态外交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具有重要启示：一是该理论指引我们发展一种大外交概念，在具体事务中超越内与外的对立，统筹思考，积极因应，争取主动；二是该理论警示我们提防孤绝主义，大

力推重开放与对话，鼓励深度理解他者和学习他者，转变对待差异的态度，避免外交上“夜郎主义”；三是该理论鼓励我们在外交行为主体和外交对象越来越多元化的当前，要大力发展微外交和民间外交以裨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宏大外交的不足；四是该理论强调在外交活动和国际关系中，应以人为本，以情为重，互相理解与体谅，实践有情外交。

四川外国语大学林克勤教授在《拉伸与重构：生态文明视阈下的当代中国话语》论文中认为，国际话语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是全球资本广泛交集和激烈竞争的前沿地带，也是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以话语为形态进行展示的舞台。场域理论揭示了这种展示与竞争的暴力性和矛盾性，并反映了这种权力逻辑对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与固化。当下的国际话语体系由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并对中国话语采取拒斥和打压的霸权立场。要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争得一席之地，中国话语的重构与重述势在必行。采取割裂式的民族主义应对策略来提高中国的国家话语权显然是不够的，而应立足于生态文明的视阈，对东西方各种零碎方案进行拉伸与整合，展现一种贯穿、高远的包容精神。这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新路径。具体而言，即一方面借用批评话语分析的语境研究范式，一方面重建和再造中国自己的知识思想体系，实现穿越西方、回到当代的学术构想，在用经过现代改造和重新阐释的新儒学反思社会民主的另一副面孔的同时用一种全球性、具有普世意义的话语体系及社会语境与西方人文大潮进行理性对话和互补增益，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愿景。

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衡孝庆教授在《论生态融合》论文中指出，生态文明意味着以文明的态度对待生态系统，其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不只是局部领域内的改变，而必须是根本性的、全面的变革。从生态自身的整体和生态影响的复杂性到解决生态问题的多主体性，都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走生态融合之路。生态融合，就是在彻底改变对待自然态度的基础之上，将生态理念、生态认识贯彻到底，以生态思维统领人类社会，以生态化方式改造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整

个人类社会，让人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重新融入自然生态之中。自然系统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工业社会的致命缺陷决定了走生态融合之路的必然性。

南京晓庄学院王国聘教授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核心内涵》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世界观，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明确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社会目标追求，坚持人民共享优美生态环境的社会主义文明性质，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科学认识和解决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点关系，奠定了先进思想基础，确立了鲜明价值导向。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周中之教授在《消费伦理：生态文明建设的道德支撑》一文中认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消费伦理观念的革命相对于制度建设，政策调整等工作居于更为基础的地位，没有消费伦理的革命，就没有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张修玉教授在《科学揭示“两山理论”内涵 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文中指出，“两山理论”，即“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揭示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三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剖析了环境与经济在演进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包炜杰博士在《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是否可能？》一文中，通过对生态文明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基础等问题的分析，对内含“生态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极限而成为一种新文明类型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三、生态文明与中国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副会长王春益研究员在题为《生态文明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大会发言中对生态文明的本质，生态文明的

中西方思想基础、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中国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及其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等问题进行阐述。王春益认为，生态文明的主体是“人”，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只有共存共生，才能共育共荣。建设生态文明，不是要放弃工业文明，回到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生命健康的生态文明社会。生态文明来源于生态思维，在中西方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思想菁华。中华民族的生态思维蕴含在其文化理念中，体现在伦理制度中，延续于历史传统中。同时，西方的盖娅假说、过程哲学、深度经济学、有机马克思主义等思想从整体性、过程性、可持续性的观点看待自然和人类，表现出深刻的生态思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生态文明的土壤和根系，西方优秀思想文化为生态文明提供了植被和营养。”王春益认为，当前中国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实践上对这一问题都有了明确的认识与积极行动，并且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扮演全球生态文明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角色。

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全教授在《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刍议》一文中指出，面对全球生态环境危机，世界各国开始探索适合自己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顺应全球绿色发展潮流，提出了生态文明思想，并为全球实施生态文明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十九大”报告中就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为中国最终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文化的绿色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重庆社会科学院《改革》杂志社副总编文丰安教授在《当代我国生态文明价值诉求的失衡及防治》文章中认为，在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阶段与发展动力等面临全局性挑战，环境与政策过程日趋复杂的当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强化“绿色政治”，从各级党组织执政思维方式的

绿化、各级政府强化生态法治政府建设、各级生态环境行政监管体制的完善、公民生态思维和行动方式的培育与强化等方面优化路径，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走向多元参与的“善治”之路。同样来自重庆社会科学院的孟小军在《中国西南民族村寨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学考察报告》一文中指出，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是中国乃至世界重要的生态区，具有重要的生态文明建设价值和意义。通过对西南民族村寨的人类学考察发现，在许多民族传统文化中仍保留和延续着崇尚自然、善待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和事例，这既能丰富生态文明建设的人类学资料库，更是借鉴民族民间经验进一步推进当下中国建设更高水平的生态文明珍贵的人类学实践指导。

韩国韩信大学郑建和教授在《再议生态文明之经济维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一文中认为，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中国在经济道路的选择上，应该放弃对造成当前生态危机的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的跟随，重新审视与描绘经济，超越二分法的思维，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和生态的融合，探索实现生态文明的第三条道路。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郭芙蕊副教授在《中国社会发展新时代公众生态意识启蒙的实践价值》论文中对生态危机的表现、公众生态意识启蒙在新时代生态危机解决中的作用以及公众生态意识启蒙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所韩东娥、郭永伟在《努力推动能源革命 加快实现绿色发展》的文章中对山西省进行能源革命，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及具体路径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李娟娟副教授《马克思生态文明理论视域下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减贫的实践研究》的文章，使用陕北榆林市南北12县（区）的24个乡镇入户调查数据，讨论了生态环境与贫困的因果关系、生态环境与贫困的地理关联、生态环境与贫困的动态影响等问题，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提出了解决榆林地区生态贫困的对策。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岩博士在《文化软实力的中国特征》一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既有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的红色基因，又有五千多年华夏文明的黄色血统，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特性。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特性，表现在文化的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文化的历史性和民族性的统一、文化的时代性和世界性的统一等方面。重庆邮电大学郑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探析》文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主要任务进行了阐述。

四、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克里福·柯布博士在《生态文明与清静无为：智慧修复与重建中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认为，“生态危机”无疑已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之一。应对威胁，根本上需要对当前的生产生存方式进行改变，正确组织经济与政治的运行方式。强制与自由是确保政治与经济正常运行的两个重要手段。历史上最优秀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家总是从历史中发现智慧之路——超越强制与自由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的阴阳辩证逻辑。中国儒家对此贡献了基于互惠社会责任之上的稳定社会秩序的智慧形式，“无为”是治国理论的一部分，强调政府的作为在于为健康社会创造和谐条件，一旦社会规律符合自然规律，政府将无须存在，自然秩序和个人行动自由将在一个强大国家和善法的背景下实现。遗憾的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无为”思想由于各种原因，在当前西方被曲解为哈耶克式的“自发秩序”并最终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出现。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无为”思想的厘清不仅有助于借助“无为”的原始概念克服自我毁灭的因素，统一有益因素，促成新经济管理形式出现，也有助于定义人类自由与自然界限的辩证思维新方式，提供为共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而建构国际秩序的新思路。目前生态文明的政治经济最需要的是恢复使自然系统繁荣的条件。作为对缺乏智慧的现代政府和经济学理论的匡补，中国“无为”理念提出了以超越长期存在的自由

和强制的辩证关系的方式智慧治国的可能性，为用新的方式组织社会带来了希望，使生态文明成为可能。

黄河科技学院鲁枢元教授在《陶渊明的田园时光，柯布先生的生态愿景与中国当下新农村建设》一文中，用诗一般优美笔调实现了柯布博士和陶渊明这两位时间跨越千年，空间横亘万里却有着思想共通之处的哲学家的智慧交融与思想对话，并借以对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提出了建设性意见。鲁教授指出，作为柯布博士长期为中国“三农”问题进行深入反思、思想启蒙与奔走呼吁的结果，当前中国政府在“三农”问题上的治理理念与政策选择在许多层面与柯布博士的农村生态愿景有了某种一致性。但差异依然存在，这根本反映在当前中国政府“三农”问题的政策选择基本上仍沿用“现代化”的思维方式，而对“现代化”思维与实践保持反思与警惕正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底色与特色。鲁教授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深刻观察到以“现代化”思维方式展开的新农村建设在带来某些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导致农村发展愿景的迷失。柯布教授提出的以传统文化为延伸线，更符合生态精神、更适宜人类诗意栖居的后现代乡村才是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真实愿景。东晋田园派诗人陶渊明的诗意人生与田园时光正是这一后现代乡村的最好诠释。陶渊明对“清贫与富足”“休闲与劳动”“亲情与金钱”“回归与进步”四组命题所做的思考、抉择、实践与坚持可以给予当下建设后现代新农村最为直接与深刻的启示与借鉴。

渤海大学杨道宇教授在《通人与分享：论王阳明的命运共同体教育思想》一文中指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阳明心学，在融通儒释道“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命运共同体思想，并以“通”释“圣”，将圣人定位为致力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通人”，从而形成了以命运共同体为旨趣的“通人”教育思想。具体包括“通天”以建“心物共同体”、“通融”以建“文化共同体”、“通化”以建“学问生命共同体”、“通情”以建“人类共同体”、

“通生”以建“生态共同体”等方面。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石书臣教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智慧》文章中对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沿革进行了梳理，揭橥其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石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仅对人在自然界中的主观能动性做出肯定，更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和谐发展的统一关系，这对于我们树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观，提高人们保护环境、珍惜资源的意识，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观，具有重要现代启示。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磊博士在《略论道家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文章中认为，生态文明是后现代社会的文明形态。现代向后现代社会转型，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普遍性的必然历史趋势。道家思想对于中国这一后发展国家如何应此历史趋势，做好自身的社会转型与文明转变，建设生态文明，在思路与方法上给予了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必须从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的特殊性出发，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与设计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之路，推动生态文明转型与建设的中国化。

五、生态文明的实践与思考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欧阳康院长在其题为《绿色CDP绩效评估的中国探索及其新进展》的大会发言中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以他为首席专家的“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研究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欧阳康教授指出，中外不同学者对如何把环境污染、生态损耗的经济损失计入到经济发展绩效评价中，以克服GDP作为经济发展评价指标的局限进行了长期有益的探索，分别提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不同经济绩效发展评价体系。课题组所使用的“绿色GDP绩效评估”是在管理学、政治学等跨学科视野下，借鉴环境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成果，通过有效区分、精准诊断、科学指引，服务“治理、

决策”，是一种“理想与现实兼顾”的新探索。这一研究思路与方法的本质是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哲学思想、方法在绿色GDP问题上的综合应用，由此为绿色GDP提供了明确的内涵与边界。以此为指导，课题组从不同“绿色GDP”定义出发，解构“绿色GDP”的科学内涵，分解“绿色GDP”的实质性要素，获取具有共识性的指标，构建由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52个三级指标、45个分行业统计与评价的新型“二维矩阵型”绿色GDP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形成10个数据采集表单，并在独立开发“绿色发展大数据分析平台”的基础上，对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绿色GDP绩效评估。经过两年努力，现已发布《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报告（2016年湖北卷）》《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报告（2017年湖北卷）》《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报告（2017年全国卷）》等三份标志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研究最新进展的研究报告。三份报告，在分别选取能源消耗、环境损失、生态损耗等维度的大量数据基础上，借助“绿色发展科研平台”开展大数据分析与管理，对2016年、2017年湖北省和2017年全国绿色GDP绩效进行评估，从多个维度说明了湖北省17个地州和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绿色发展现状、规律和态势。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实践，不仅有益于中国，而且能为面临“发展”与“绿色”两难选择困难的其他国家提供中国经验与方案。为此，欧阳教授表示，课题组将持续开展研究探索，力图用严肃的科学数据引导人类社会放弃唯GDP主义、极端消费主义、经济主义等现代化产物，转而走向更加健康积极的后现代。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运武教授在《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践：偏差与校正》一文中，根据自身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与访谈调研，对当前存在于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何时做、谁来做、怎么做三方面偏差的产生原因、表现形式及校正方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在《生态文明建设及研究的弊病与改进策略》一文中通过对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

的实践观察，对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及研究中存在的误区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该所的杜香玉博士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思考》一文中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纳板河自然保护区为个案，讨论了当前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存在的困难和解决对策等问题。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柯尊清博士在《环保领域省以下政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文中认为，环保领域省以下政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因此，对政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就需要围绕“事由谁承担”（财政事权归属）、“钱由谁出”（支出责任承担）、“钱从哪来”（财力保障）三个方面展开，以事权属性定归属、以事权归属定支出责任、以支出责任定财力配置，在厘清政府职能边界的前提下，探寻政府财政事权与支出配置的有效实现形式，不断提高改革的协同性与规范性。

美国克莱蒙“非凡福祉项目”执行主任南希·敏泰在《走向生态文明的第一步》文章中对“非凡福祉”这一以推广和实践生态文明理念为宗旨的公益机构的理想、实践与愿景进行了介绍。美国加州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的克里斯托弗·查普尔教授在《两个印度生态行动的实例——致力于保障小农存生的九种基金会和印度绿色建筑委员会》一文中对致力于探索印度绿色发展模式的九种基金会和印度绿色建筑委员会，两个非营利组织的实践与成就进行了介绍。美国加州拉文大学的杰伊·H.琼斯教授在《范式转换：面向“人类世”的STEM教育发展新方向》一文中对当前STEM教育存在的弊端及其实现STEM教育研究范式转变的路径与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阐述。北京林业大学铁铮教授在《增强生态文明传播的有效性》一文中，对生态文明建设中媒体有效传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当前媒体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其表现形式和如何加强与改进生态文明传播的对策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南京林业大学乔永平在《镇江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一文中，对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之一的镇江市在生态文明建

设过程中积极探索协同治理的动因、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和进一步改进的对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婧在《大数据时代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文章中认为，大学生群体是当代青年中的优秀群体，具有思想活跃，善于接受新鲜事物，能快速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等特点。在大数据时代对大学生开展生态文明观教育，需从中国传统的生态观、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三个方面系统全面地开展对大学生的教育。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